

五四民主精神

◎朱志敏／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研究



五四民主观念研究

朱志敏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民主观念研究/朱志敏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ISBN 7-303-04127-3

I. 五… I. 朱… III. 民主-政治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N. 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302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232 千

199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定价:9.40 元

序

我的学生朱志敏，是个勤奋好学，肯下苦功夫钻研的人，并且遇到问题总要究源竟委弄个明白，北京话叫“好较真儿”。唯其如此，他才不畏艰难，对一个学术界探索多年，硕果累累的老问题进行研究，埋头写作，终于成书，并能提出新的见解，这是很不容易的。我看，这本书优点有二：一是对五四时期民主观念的演变进行全面考察和多层次分析，这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多见；二是史料丰富，并提供了一些新的未曾有人用过的史料。书的出版对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研究，对于促进社会政治现代化，都有参考价值。

在书中，作者为自己的研究确定了一个出发点，即“深入研究在五四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如何理解民主、自由的含义与价值，他们的理解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取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些变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有着什么样的意义”。这个想法很好，确是真知灼见。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极普遍的人类现象。对于同一事物的认识、理解，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要受自身所处地位、环境以及知识基础的制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时，也无例外地要受本国的、本民族的历史和现时的诸多条件的制约。人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它，以适合本国、本民族的需要。西餐在中国永远是中国式的西餐，中餐在外国永远是某国的中餐，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研究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的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如果一味从民主观念的本来含义上去分析，总难于对上号。本书

作者力图摆脱这种做法，另辟新路，值得称赞。可惜，作者没有完全脱俗，书中仍留有从概念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痕迹。说实在的，某种外来思想、观念被中国人接受，并按照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应用于实际，取得一定成效，不是很好吗？大可不必用某种思想、观念的本来含义去挑剔。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是因为人们把它与中国实际结合。什么时候结合不好，什么时候就会出差错。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按照中国的方式所传播的民主观念中的合理成分，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被吸收，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并进而转化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当然，对于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的民主观念中合理因素的吸收，以往的努力，未必尽如人意。今天，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之时，仍应继续掘其精华，充实自己，以求更为完善，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由被动向主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期，这个时期里有许多东西都具有开创性，对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成形的现代化意识、现代化思想，大多源于此，民主观念就是一种。辛亥革命之前，早已有人传播过西方的民主观念，但其影响甚微，以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是在较有文化的官界、商界、知识界中民主观念也很淡薄。应该说，五四时期对民主观念的传播，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与以往都大不相同。自此始，才有更多的中国人包括工人、农民，要求民主，并投入争民主的行动中，这是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显然，如果把对五四时期民主观念的考察，放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分析，也许更能透视出其深刻的意义，更能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

写了上面一些话，供读者在看这本书时参考，权为序。

张静如

1995年元月于北师大

目 录

序	张静如
导 言	(1)
第一章 五四时代的中国社会与知识分子	(4)
第二章 五四民主观念的发展和演变	(30)
一、“人权”口号的提出与“惟民主义”观念的出现	(30)
二、“庶民主义”的解释与“德谟克拉西”的流行	(38)
三、“平民主义”思潮的发展与无产阶级民主观念 的产生	(45)
第三章 五四民主观念的内容	(64)
一、精神的民主	(64)
二、政治的民主	(81)
三、社会的民主	(125)
第四章 五四民主观念的特点	(134)
一、与戊戌、辛亥时代相比：发展与深化	(135)
二、与西方民主思想对照：杂糅与变异	(149)
三、从传统文化角度观察：影响与制约	(161)
第五章 五四民主观念的不同表现形态	(174)
一、“个性自由”派	(174)
二、“全民政治”派	(180)
三、“贤能主义”派	(190)

第六章 五四民主观念的社会影响	(204)
一、民主观念与新教育思潮.....	(204)
二、民主观念与五四爱国运动.....	(215)
三、民主观念与社会主义思潮.....	(229)
第七章 五四民主观念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242)
一、从启蒙到革命的思想基础.....	(242)
二、平民主义与中共建党之间的联系.....	(248)
三、工具民主与精神民主的统一.....	(255)
第八章 五四民主观念与现代中国	(262)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274)
后 记	(277)

导 言

五四时代的民主观念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一项重要课题。国内以往的研究多把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中宣传的个性解放、人权民主观念归结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认为在五四运动爆发，社会主义思潮兴起，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后，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便成为相对落后的思想，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仰，由此得出了五四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是“由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结论。与国内学者大抵以陈独秀、李大钊等“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为主要依据的作法不同，港台和西方学者以胡适等“自由派”人物的思想为依据，从自由主义如何在中国失败的角度讨论五四民主思想的命运。引人注目的观点是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德(Jerome Grieder)的“排拒的移植”说，即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在于它是受到中国原有文化有机体的排斥的外来观念。^①而华裔学者林毓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与“传统一元论的思想模式”影响之关系的考察^②，在某种意义上支持了格里德的观点。

以上两种基于不同出发点的研究之所以得出了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遭到挫折的相同结论，很大程度在于二者都从西方涵义来界定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想。然而这种界定却忽视了两个明显的事实：其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包括先前未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知

^① 见张静如主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第16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

^② 见林毓生：《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载《思想与人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

识分子和一直从事民主斗争的革命者)对民主或自由的理解及对它们所含内容价值的强调并不一致;其二,当时人们的民主观念并非一成不变。^①把那些既不统一也不确定的观念笼统地归结为已有确定内容与含义的某种价值观念不但不适当,而且容易忽视那些实际存在的不确定观念的本来内容及其意义。因此与其满足于“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结论,或停留于从西方意义的自由主义来探讨它在中国的命运,不如进一步深入研究在五四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如何理解民主、自由的含义与价值;他们的理解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取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些变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尽管如此,为使本书的讨论能在史实与分析相结合的层面上进行,还是有必要说明作者对“民主”一词的理解。如果按照词汇所包含的不同层次内容来解释,“民主”可分为广、狭二义:狭义的民主是指具体的国家政治制度,即名义上属于人民的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等制度设施及其组织、运作方式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主国家还可以分成奴隶制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等不同形式。广义的民主除包括狭义民主的内容外,还指社会生活中的某种价值观念、原则,其内容包括自由、平等、公正等等。狭义民主亦可称为“形式的民主”或“政治的民主”;广义民主亦可称为“精神的民主”。由这种理解我们可以说:五四时代是中国人认识“人权”自由、平等之类精神民主,并将此类观念同政治民主相联系的时代;同时也是人们重新研究、理解民主,将精神民主与经济、文化、教

^① 这些事实近几年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参见刘桂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属性及其主要口号的释义分析》,载《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王桂林:《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演变》,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美)阿里夫·德里克:《五四运动中的意识与组织:五四思想史新探》,载上引《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第52—54页。

育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相联系，提出“民主的社会”观念的时代。就政治民主的含义说，五四时代人们的观念中尽管仍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内容，但受到社会主义和其它新思潮的影响，人们更多地进行了改造旧民主，建立新民主的探索，出现了不同表达方式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等等观念。另一方面，由于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东西方文化价值的选择问题上出现了所谓“复归”现象，一部分人有意识地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某些体现自由、平等、公正一类的价值观念，以融会到对民主的认识与理解中。而那些明确将民主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立，表现出某种形式的强烈反传统倾向的人，在他们理解和选择民主价值的过程中，也不能不受到他们直接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和积淀在他们意识深处的某种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这种情况使得本来作为西方社会与文化产物的民主，在五四时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不能不带有某种特殊的含义。

由此说来，本书讨论的五四民主便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而是具体的、动态的；不是仅涉于政治的，而是泛指政治的、精神的、社会生活的；不是单指某个阶级的，而是指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不是指西方意义的，而是指注入了中国人自己的理想意识的——一句话，本书所探讨的是生活在五四时代中西文化交流氛围中的人们对民主的认识、理解、选择、期望，以及它们发生、发展、演变的原因、过程、特点和影响，进而揭示由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些矛盾方面，为我们今天解决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提供历史的参考。

第一章 五四时代的中国社会与知识分子

本章的题目涉及了两个极广泛的讨论内容，无论就“五四时代的中国社会”，还是就“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可以写出字数不少的专题著作，这当然不是本文的用意所在。以这样一个题目作为本书的开篇，用意在于为我们将要涉及的主题提供一个背景轮廓，以便为我们的讨论提供帮助。因此，这里所说的“社会”，并非严格的社会学或社会史中整体意义的“社会”，而是指对当时人们的民主观念发生影响的某些“社会”因素。对于“知识分子”，我们所注重的亦只是其在特定时代表现出的一些有特征的心理倾向，特别是影响到他们认识和理解“民主”概念的心理倾向。

首先分析五四时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概况及其矛盾。

从横向角度观察，五四时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帝国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及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以地主所有和小农所有为主的封建经济是当时社会的几种主要经济成分。从生产方式的性质看，在全国范围内占压倒优势的是封建经济生产方式，即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它构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在现代工业生产部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占有支配地位，他们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在铁路、矿山、机械制造等现代工业的主要部门占据优势地位。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在现代生产行业的比重中超过外国资本，但其所属大多在轻工业部门，工厂规模小，资金有限，技术水平低，加之封建统治势力的种种羁绊，以及连年内战的骚扰，力量十分薄弱。

在整个经济运作过程中，官僚买办资本常常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起来，压迫民族资本。民族资本一方面要求得到军阀政府的支持，乃至帝国主义的帮助，另一方面则想摆脱帝国主义、军阀政府的压迫、束缚。

再从物质分配方式分析：在占压倒优势的自然经济部分里，地主阶级占有制下的地租剥削相当普遍。除此之外，占农业人口大多数的无地、少地农民还要担负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借债、抵押和连年战争所带来的不断增加的、名目繁多的捐税。沉重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加上自然灾害，使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在城市，工厂工人的工资很低，工作及生活环境恶劣，而物价上涨速度却相当快。同时，在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收入微薄的小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这些人没有如小农一样可在丰年维持半饱的一小块土地。他们之中或靠小手艺谋生，或当店员、伙计、小学教员，或卖苦力，更有的沦为乞丐、娼妓，其中大部分人生活窘迫，入不敷出。中国自古以来城市文化即带有消费人口多，生产人口少的特征，而近代以来，一方面封建经济受到工业文明的侵蚀而逐渐解体；另一方面，发展不足的现代行业尚无力吸收消化大量失业人口。这种情况导致当时城市中的“平民生计”问题十分严重。^①这些包括工人在内的城市“平民”和大量农民构成当时社会的下层阶级。他们忍受着来自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统治阶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伦理道德的、家族的，对于妇女来说还要加上男权的层层叠叠、各种各样的压迫。这就是当时知识分子思考政治、社会问题所面对的现实。

再从纵向的角度考察。1914—1923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忙于大战，暂时减少了对中国的投资及商品输出，日本和美国则借机扩大在华势力。特别是日

^① 五四时代文献中反映出，此问题是当时知识分子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本,仅1913—1919年间对华企业投资就由38000多万日元增加到88000多万日元,从而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中跃居首位。二是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明显的发展,这一时期甚至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空前发展”的“黄金时期”。有关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数字资料在许多教科书、资料集中多有论列,这里不加赘笔。但我认为,究竟如何估计这一情况对五四时代思想观念发展所起的作用,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想举出一点事实: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呈较快发展趋势从1905年前后似已开始。为了说明此点,我们选择了通常人们用以说明五四前夕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所引用的,由汪敬虞、魏金玉编制的“1895~1919历年设立的厂矿及资本统计表”^①(表见下页)。

从统计表中可以清楚看出:1905年以后历年设立的厂矿数和资本额除个别年份外,均明显高于前10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9年(按本表的截止年代)。但以往的引用者常常作这样的对比:在1895—1911年这一段,十七年间设立的厂矿共计490个,资本额11131万元,平均每年设厂矿29个,资本额655万元。1912—1919年八年间设厂矿472个,资本额9478万元,平均每年设59个,资本额1185万元。这样比的结果,后八年设厂数和资本额的年平均值远远超过前十七年。以此来证明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到五四前夕,民族资本主义明显发展的观点。我认为,这种比法是不大科学的。因为,从表中数字看,1905年以前的十年设厂矿与资本额数目明显偏低,以前十七年与后八年划分阶段,差距自然就很显著。如果我们换种比法,以1912年以前的八年和1912年以后的八年相比,就会出现另外的结果:1912年以前的八年共设厂矿348个,平均每年设43.5个;资本额总计8346.3万元,平

^① 本表来源:汪敬虞、魏金玉《五四运动的经济背景》,《经济研究》1959年第4期。

均每年 1043.4 万元弱，与后八年相比已无大差距。倘若不计五四运动发生的 1919 年，以 1912 年前后七年的情况比较，设厂矿数为 46 比 54；后面偏高；资本额则为 1105 万元弱比 965 万元弱；前七年增加的资金额反而超过后七年。

历年设立的厂矿及资本统计 (1895—1919 年)

年代	设立 厂矿数	资本额 (千元)	指 数 1895=100	年代	设立 厂矿数	资本额 (千元)	指 数 1895=100
1895— 1919	962	206095		1907	58	14058	425. 1
1895	17	3307	100. 0	1908	52	16122	487. 5
1896	20	4343	131. 3	1909	36	6638	200. 7
1897	23	5776	174. 7	1910	32	7398	223. 1
1898	20	4384	132. 6	1911	16	2087	63. 1
1899	11	1910	57. 8	1912	44	3702	111. 9
1900	13	3304	99. 9	1913	49	5280	159. 7
1901	6	145	4. 4	1914	51	7169	216. 8
1902	20	4059	122. 7	1915	73	9253	279. 8
1903	12	622	18. 8	1916	49	10434	315. 5
1904	26	6121	185. 1	1917	54	9652	291. 9
1905	60	8138	246. 1	1918	61	22043	666. 7
1906	68	22901	692. 5	1919	91	27244	823. 8

资料来源：1895—1913《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657 页；1914—1919 年设立厂矿明细表（未发表）。

编者注：各厂矿资本均系在万元以上者。1912、1913 两期增补了原统计未列入之小厂。

从以上的比较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五四前

夕^①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趋势早于1905年前后即已开始，欧战开始后的显著发展不过是连绵峰峦中的较高部分。事实上以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和西方一些国家早期由工场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过渡时期的发展速度相比，差距是相当大的。当时有人在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时发出这样的感慨：“五十年中中国之工业不可谓无进步矣，然其行也过缓……五年欧战，天与中国以自新之机，又以政争自扰而虚度。”^② 这恐怕不是无端而发。

以上的分析，不在于否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五四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明显发展这一论断，而只在于说明，这一发展的速度，规模仍是十分有限的。至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当时对于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的发展究竟产生多大作用，历来研究者的看法不同。重视二者间联系的意见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队伍，鼓舞了民族资产阶级日益迫切地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并在政治上加强自己地位的愿望。从而促发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及民主思想潮流的高涨。或者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发展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而且扩大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给中国无产阶级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准备了物质条件”；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并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新民主主义，“是从辛亥到五四一个长时期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关系作用的结果”^③。

这方面的意见虽然分别从前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两个不同的侧面出发，其结论都是强调了此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① 据近些年研究成果，五四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仍在持续，直到1923年前后。

② 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1923年2月申报馆编辑出版。转自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③ 前引汪敬虞、魏金玉文：《五四运动的经济背景》。

和作用。

另一方面的看法以近几年来持文化史观的部分人为代表。他们突破过去从经济入手研究历史的思维框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看作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在了解西方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的原因的过程中，继器物、制度文化以后的思想文化层次的觉醒。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肯定作为新文化启蒙核心内容的民主、科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但却多少忽视了在实际历史进程中，那些历史地存在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因素对于启蒙观念本身的影响，及这些影响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

我认为，从欧战到五四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未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地位。如果说，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那么，到了五四时代，民族资产阶级仍旧没有发展成为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力的独立力量。在五四期间，他们很少主动地完全为自身利益进行反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压迫的斗争。更多的场合是，他们出于和其它阶级一样的爱国主义愤和同情心，参与各类政治运动。他们在要求民主的运动中，需要和其他阶级、阶层互助合作。我们注意到：在当时的大量材料中，除了抵制日货外，很少宣传直接为民族资本主义自身利益服务的言论。相反，由于时代的影响，批判资本主义，宣传阶级合作，以至宣传推翻资产阶级的材料相当多。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证实，决定五四时代民主观念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在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度的发展，而在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的状况下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现实。

这种矛盾现实正是由本章开始所谈的五四时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框架决定的。在农村存在着地主阶级和广大无地、少地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在城市存在着广大中、下层人民与上层统治者、官僚、政客、军阀之间的矛盾；在工厂存在着工人与厂主、资

本家的矛盾；在对外方面，存在着中国人民与列强侵略者间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的显著表现是到处存在不平等的现象：地主与贫苦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平等；城市中下层人民与上层社会人们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准、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一般体力劳动者与从事文化教育的脑力劳动者之间社会地位、工资收入不平等……

除上述阶级矛盾外，当时中国社会还有一个造成不平等的根源——封建家族制度。从当时的材料看，传统中国社会的家族制度并没有因为皇帝被推翻和现代经济有所发展而受到有力的冲击。发表于1922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我国现在的家庭，还是保守这种家长制度。”^①这种与封建纲常伦理紧密结合的社会生活方式决定个人的生活命脉，规范个人的思想行为，严重地压抑自由，摧残人性，是为封建专制统治培养忠顺奴才的温床；是形成人格不平等、男女不平等，造成婚姻悲剧、社会悲剧的罪恶渊薮。

有压迫、束缚，就有反压迫、反束缚的愿望；有不平等的存在，就有平等的要求。五四时代的社会种种不平等状况，是当时人们从追求政治平等转为追求人格平等及社会平等的现实根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我认为，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各种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对五四时代人们理解民主，追求平等、解放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内在的、深沉的和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

下面，让我们看看五四时代政治方面的情况。

五四时代的政治局势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共和政治形式成为军阀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二是在统一国家的名义下，形成地方割据的局面；三是国内外在短期内接连发生重大政治事件，使本来就不稳定的政局更加动荡不安。

辛亥革命推倒传统的皇权专制统治，以西方现代国家的模式

^① 陈侃谋：《小家庭主义的我见》，《青年进步》第49册第56页。